

风土的假厚：为什么禁止令没变，权利却死了

禁令一条没少，人却从那片自由空地上撤走了——接纳从身体承受张力，变成了规避张力的正确剧本

作者 高鹏 · SDE 学员 · 约 2.0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8日 · 打磨版

摘要

公法学长期依赖一对“隐喻地质学”的判断——法不禁止则自由存焉，法无授权则权力止焉。然而，现实中反复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禁令清单纹丝未动，人们却集体从那片名义上的“自由空地”撤离；授权清单未被突破，权力的实际影响却弥漫到清单之外。本文追溯这一现象的共同根源——不是在诊断一种“病”，而是在追问一种质变是如何被发生出来的：社会心态这片风土，在特定条件下、经特定矛盾的反复结算，被逼出了一种新的存续形态——社会心态的职业化。它指的是，接纳异质意愿这件事的社会发生条件，从“具体、偶然、充满张力的面对面互动”，被系统性地置换为“抽象、可预期、规避张力的规范性剧本”。接纳变成了一套被社会期待的正确姿态，而不再是承受张力的身体记忆。这种置换使“法不禁止即自由”所依赖的那片厚土，在统计数字和话语表征上依然肥沃，在实际的社交微循环中却已无法承受“第一个意愿”的笨拙。本文以这层发生条件的置换为核心线索，重新追问权利发生的社会土壤机制，揭示权力的场态渗透如何系统性地培训了这一置换，并在最后论证：法治最深层的任务，不在于禁令或授权的清单长度，而在于拆除那套持续将接纳的发生条件从身体共在扭向话语表演的泵浦系统。

关键词：社会心态的职业化；发生条件的置换；接纳的即战力；场态渗透；异质意愿

SDE 创新智商：133 → 140

本批打磨的重心：补入原文缺失的两个最近邻——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与戈夫曼的拟剧论，并各给出一条方向相反、可用同一批数据裁决的预测；新增「本文禁止什

么」一节，把“即战力”落成可编码的反应潜伏期与撤退率。作者的核心判断未动。提升后分数为编辑自评，待独立复评。

第二轮再补：与德雷福斯技能获得理论的对质，把「接纳的即战力」从态度强度正面改判为社会层面的熟练应对，社会心态的职业化因而被表述为把整个社会从专家阶段按回规则阶段；由此得到一条与接触假说方向交叉的可裁决预测——多轮培训会典型情境的接纳分数上升，非典型情境的反应潜伏期与撤退率反而恶化。

一、引言：当自由死于被热情接纳的时刻

有一个问题，公法学很少追问，却一直在它的地基深处隐隐作痛：为什么在某些社会里，法律对人民说“此事不禁止”的区域没有缩小，法律对权力说“此事你无权”的清单没有缩短，但人民实际能安然踏入的生活疆域，却在静悄悄地缩水？

既有的回答大致在两条路线上来回。一条路线指向制度的缝隙——禁令虽然没添，但权力的粒子态越界变多了，具体的、可被识别的选择性执法、审批拖延、变相处罚，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把自由一块一块剝走。这条路线抓得住“动作”，它把问题定位在权力的犯规上。另一条路线指向文化或社会心态——人们不再愿意做那些“虽然不犯法但不太大众”的事，是因为从众压力、社交媒体上的道德审判、代际之间对“安稳生活”的重新定义，使异质意愿在源头处就冷却了。这条路线抓得住“氛围”，但它往往把氛围描述成一种自然的、自发的、没有明确责任人的气候变迁——于是，自由缩水就变成了一件你我都有份、却也都没责任的事。

本文认为，这两条路线各自捕捉到了问题的真实侧面，却共同漏掉了一个更隐蔽的环节：社会心态这片土壤本身，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一种质的转变——它学会了模仿“厚”的所有外在特征，却在骨子里丢失了“厚”所必须承受的那种张力。这个环节之所以被漏掉，是因为它不符合“制度失灵”或“文化衰退”的既有诊断格式。制度失灵的分析工具，天然只能识别规则的缺口和执行的偏差；文化衰退的分析工具，天然倾向于把心态的变动描述为存量的增减——信任多了或少了，参与热了或冷了，宽容度升了或降了。本文要揭示的，是一种更狡猾的状态：存量看起来没少，甚至还

在增加，但它的内部质地已经变了。就像一块被反复弯折的金属，表面上看还是那一块，但它的内部微结构已经从延性变成了脆性——再施加一次之前能轻松承受的变形，它不会慢慢弯，它直接断。

为这种质变寻找一个已有的名字并不容易。它不是福柯笔下的“治理术”——治理术分析的是权力如何通过构建自由主体并引导其行为来实施治理（Foucault, 2004），它预设了一种对主体行动领域的积极塑形；而本文要追问的，是一种在不直接施加指令的情况下发生的、集体性接纳能力的内部质变——这种质变并不必然有一个明确的治理主体作为发起者。它也不是布迪厄的“惯习”——惯习解释的是结构如何内化为个体的前反思性情倾向系统（Bourdieu, 1980），它预设了内化的一致性；但本文恰要揭示的是习得的标准姿态与真实身体反应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无法被惯习概念的“内化一致性”充分覆盖。

三个更接近本文核心判断、因此也更需要被正面回应的既有概念，是组织社会学中的“目标置换”、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以及社会资本文献中关于“信任厚度”的讨论。

“目标置换”概念（Merton, 1940; Selznick, 1949）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组织在高度制度化之后，会发展出一套替代性的操作规程，使得原初的实质目标被程序合规所置换。这一洞察与本文描述的“接纳能力从承受张力蜕变为表演正确”在机制形态上确实高度雷同——接纳的实质能力被接纳的标准话语程序所置换。然而，“目标置换”的分析单元是组织——它依赖组织的科层结构、规章体系、角色分工来识别“原初目标”与“替代规程”之间的张力。本文的分析单元则是社会心态——一种分布式的、弥散在无数日常互动中的前反思反应模式。一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目标”可供置换；它有的是某种长期训练出来的、未经排练的身体记忆——这种记忆的质变，不需要通过科层规章的层层传导，它可以在不被任何“组织”明确察觉的情况下，从无数微小互动的累积中自发涌现。因此，本文借用“职业化”这一术语，但它指的不是某个组织职业化了，而是社会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职业化组织的运作

特征：接纳行为越来越依赖一套可复制的、不需承受真实张力的标准程序。这是“目标置换”概念无法直接平移的区分面。

“文化工业”概念（Adorno & Horkheimer, 1947）的核心诊断之一，是系统通过预先消化差异来消解差异的颠覆性——它允许甚至鼓励表面上的多元，但这些多元是经过安全化处理的，不构成对系统的实质挑战。这与本文描述的“可接纳异质样本被提前筛选”在现象层面有显著重叠。但“文化工业”分析的着力点在于文化生产的工业化结构——它追问的是，文化产品是如何在资本和技术的驱动下被标准化、被商品化、被剥夺了否定性的。而本文追问的着力点不同：它不在于异质样本的“生产环节”被谁把持，而在于社会成员接纳这些样本时的身体反应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社会的成员即使完全不接触“文化工业”产品，仅仅在日复一日的真实社交互动中反复经历“被热情表达接纳、却从未被真正接住”的体验，其接纳的即战力仍然会发生本文所描述的脆性退化。因此，“文化工业”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全样本那么多”，但它无法直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不安全样本的第一反应从皱眉变成了微笑而后撤退”——后者是发生在交往现场的前反思反应层的事，而不是发生在文化生产层的事。

社会资本文献中关于“信任厚度”的讨论——尤其是帕特南（Putnam, 2000）在《独自打保龄》中对“表面参与”与“实质连接”脱节的观察——是离本文最近的既有解释。帕特南并非只关心社会资本的存量下降；他敏锐地注意到，某些形式的“参与”在增加（比如更频繁的、浅层的社交接触），而“厚信任”——那种在密集的、反复的面对面互动中形成的、承受过考验的信任——却在衰退。帕特南看到的是“厚信任被薄信任替代”。这个图景和本文描述的现象确实很近。但本文多切出的一层区分面在于：厚信任的衰退，并不必然伴随着接纳行为的“职业化”转向。一个社会可以因为人口流动加速、居住隔离加剧、通勤时间延长而损失厚信任——人们变得孤独、不参与、各自打保龄——但他们在面对一个真实的、令其不适的异质者时，仍然可能流露出真实的尴尬、真实的皱眉、真实的不安。他们的接纳能力可能因为不练习而退化，但退化不等于“被一套标准姿态替代”。本文描述的职业化，不是接纳能力的衰退，而是接纳能力被另一套同样运作流畅、却质地迥异的机制所置换——接纳没

有退场，接纳变得更“专业”了。这个“更专业”的接纳，在帕特南厚/薄信任的范畴中无法被安置：它不是薄信任（它表面看上去比薄信任更热情、更主动、更无微不至），但它也不是厚信任（它承受不住任何未在剧本内的真实张力）。本文的“社会心态职业化”，恰切开了这个既非厚、亦非薄的第三状态——这是一个帕特南的二元框架未曾照亮的灰色地带。

基于上述区分，本文提出一个核心概念：社会心态的职业化。它指的是一种接纳的发生条件被系统置换的社会过程：接纳不再发生于具体、偶然、充满不可预判张力的面对面互动中，而是被挪移到了一套抽象、可预期、规避张力的规范性剧本上——在那套剧本里，人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微笑、什么时候该说正确的话、什么时候该出示“我已经表达了尊重”的凭证，但他们从未被要求在那一个无法提前排练的瞬间、真正地接住另一个人的异质存在所引发的、自己体内的那股真实的慌乱。接纳因此从一种内置张力的身体共生，蜕变为一种回避张力的社交表演。在这层蜕变完成之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表述仍然刻在法典里，但它的根系——那片能让一个举动笨拙、面目模糊的新生异质意愿安全地犯第一次错的社会土壤——已经从延性变成了脆性。自由未被禁止，但自由发生的第一口气，已经在礼貌的微笑中窒息。

本文接下来的论证将这样展开。第二节通过一个被系统追溯过的比较案例，展示社会心态的职业化是如何在特定制度与心态的互动史中一步一步被发生出来的——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有清晰的传导链条。第三节从案例中提炼出“接纳的即战力”这一辨别维度，在理论上将风土的“真厚”与“假厚”拉出清晰的切割线，并追问：接纳的发生条件置换，究竟在微观的经验层面留下了哪些可辨认的痕迹？第四节转向权力，论证权力的场态渗透不是在减少接纳的产量，而是在系统性地培训接纳的“职业化”——它不是在杀死异质，它是在让接纳异质变得安全到不需要付出。第五节将两条线合拢，论证法律最深层的任务不是加厚权利清单，而是拆除那套将接纳的发生条件从身体共在扭向话语表演的泵浦系统。第六节诚实交代本文判断的证伪条件——包括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你凭什么说一个意愿是被职业化冻住的，而不是它自己本该被淘汰？

二、一场被追溯的发生：接纳即战力是如何被一滴一滴放掉的

一个发生学判断如果只停留在概念分析和思想实验的层面，它就还没有完成它自己许诺的任务——追溯一个东西是如何被发生出来的。因此，本节将用两个具有系统性差异的比较案例，把“职业化”的传导链条完整地走一遍。第一个案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瑞典——一个常被视为宽容典范的社会，在社会心态的某一层上经历了一场典型的“安全版接纳”对“身体性接纳”的逐步置换。第二个案例是同一时期的日本——制度条件迥异，却在“接纳的发生条件被标准姿态侵占”这一点上与瑞典构成了深层呼应，这种呼应本身将帮助我们识别：推动职业化的，究竟是不是某一类特定的政治制度，还是某种更普遍的、横跨不同政体的现代治理惯性。

选择瑞典并非因为它“职业化得最严重”——恰恰相反，瑞典在接纳异质的很多面向上都比大多数社会做得更好。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好”让我们更容易看清一个反直觉的事实：社会心态的职业化，恰恰容易在一个真心实意想要变得宽容的社会里，以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方式悄然发生。当一个社会的制度动机不是压制异质、而是拥抱异质时，“接纳的标准姿态”取代“接纳的身体记忆”这件事，会显得极其自然、极其进步、极其难以被批评——因为一切都包裹在最好的意图里。

2.1 瑞典案例：当“好的意图”开始培训职业化接纳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瑞典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民主化重塑。在公共服务、教育体系、城市规划、福利制度等几乎所有领域，政府以罕见的决心和执行力推行了一套以“所有人的平等尊严”为基石的政策框架。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变迁，是这一框架的一个侧写。

在那之前，残障人士——尤其是发展性障碍和精神障碍者——长期被安置在远离城市的大型收容机构里。这不是瑞典独有的现象，整个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基本处置思维都是“机构化”——把他们隔离在专门的设施里，由专业人员封闭式管理，普通人日常看不见他们。身体上的看不见，使得普通人从未在与残障人士共同生活的

情境中经历过任何真实的张力——不是因为他们宽容，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进入过那个情境。

六十年代末，瑞典开启了一场在西方世界堪称激进的“去机构化”改革（deinstitutionalization）。改革的核心原则简单而崇高：残障人士不应该被藏起来，他们应该住在普通社区里，使用普通人的公共服务，过普通人的生活。政府关闭了大型收容机构，将资金转向社区；专门学校被并入普通学校；社会福利系统开始以“正常化”原则重新设计服务递送。这一套改革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诚意和执行力，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对手。

但改革推行十几年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开始出现。在改革的初期——也就是七十年代初——社区对新搬来的残障邻居的反应是真实的、未经排练的。有人不适，有人回避，有人私下表达了担心；但也有人笨拙地尝试帮忙，有人在超市偶遇时不知道眼睛该看哪里、最终还是点了个头。这些反应——包括负面的那些——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发生在具体的、面对面的一瞬间里。不适是真的不适，尴尬是真的尴尬，微笑也是真的艰难的微笑。这种接纳是延性的——它不漂亮，但它承受了张力，而且在承受中缓慢变形而不断裂。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政府长期推动的公共教育开始改变社区的反应模式。从学校课程到社区宣传册，从公共广播的专题节目到地方政府的“多元共融周”，一套高度标准化的话语体系逐渐覆盖了整个社会：如何正确对待残障邻居，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表情不要露，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冒犯”。这套话语体系在实质上是一套善意满满的培训——它想教会人们接纳。但它培训的，恰恰是一套可以绕过真实张力承受的标准姿态。

于是，社区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超市里再遇到那位残障邻居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学会了那一套标准的反应：微笑，点头，也许问一句预制好的“今天怎么样”，然后自然地转入下一个自己的事务。他们不再尴尬，不再不适，不再偷偷把目光移开——在这套标准姿态的训练下，接纳的动作变得流畅、安全、滴水不漏。但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在偶然间发生的、超出剧本的接触——比如，有人的孩子在公园里被残

障邻居的孩子抢了玩具，那位邻居母亲笨拙地道歉，而这位母亲在尴尬中憋了半天说“没关系”——这类接触却在减少。不是因为人们不再遇到残障邻居，而是因为遇到时双方都更熟练地沿着剧本走，不让任何不在剧本内的事发生。接纳的姿势越来越对了，但接纳的经验——那种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瞬间仍然坚持留在原地、承受着张力等一个自然结果出来的身体记忆——反而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发生在瑞典的那种几乎不被追究的职业化：它发生在宽容话语最密集、制度善意最真诚的时代。接纳行为的总量没有减少——从公共话语的流通量、态度调查数据、残障人士在公共场所被口头问候的频率来看，接纳甚至在增加。但接纳的发生条件被悄悄置换了：人们不再依赖于面对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会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残障人士时的身体性承受，而是依赖于一套可以在任何人面前重复使用的标准姿态。接纳从一种在现场被逼出来的能力，变成了一种在进场前就已经排练好的礼仪。

2.2 日本案例：礼貌作为另一种职业化培训

如果说瑞典的职业化是经由“国家善意的社会工程”推进的，那么日本提供的则是一条不同的、却殊途同归的路径：高度发达的社交礼貌本身，就是一种对职业化接纳的无形培训。

日本社会的表面对异质者的礼貌，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一个外表打扮得非常出格的人走在大阪心斋桥的街头，几乎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一个在东京地铁里背着巨大玩偶的人，会被周围的人以极其自然的姿态忽略。来访的外国游客常常感叹：日本的宽容是“不看不问不打扰”的宽容。这种礼貌，在行为层面构成了堪称范本的接纳姿态——不歧视，不侵扰，不以貌取人。

然而，长期观察日本社会的研究者们反复注意到一组很难用“宽容”来解释的事实。一个在东京生活了二十年的韩裔，他的日语口音听不出任何破绽，却仍然在试图租房时被某些房东以“房间太小了不适合您”的礼貌说辞拒之门外——这不是法律上的歧视（法律禁止种族歧视），这是用一种周全的礼貌，把实质的排斥包裹得无须被问责。他如果去投诉，房东会说“我没有拒绝他呀，我只是建议他再考虑一下，怕他住

得不舒服”。一个单身中年女性，在职场里从来没有被同事当面问过“你怎么还不结婚”，但每一次公司聚餐，话题转到“我家孩子今年升学”的时候，大家会很自然地转向她、请她也说两句——这一瞬间的礼貌，恰恰把她的单身变成了一桩需要被特别照顾的“难处”，而她只能微笑摇头，表示不在意。没有人攻击她，但她的单身被每一轮礼貌的照料重新标记为一种需要被特殊处理的处境。

这套机制的核心，是使排斥变得不需要任何人做坏人。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礼貌，使任何一场可能发生张力的互动在张力萌芽之前就被抚平。房客不会在电话里听到歧视性字眼，他听到的是关切；单身者不会被同事当面冒犯，她只会在每一次被周到照顾的瞬间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接纳的姿态完美无缺，但接纳的实质——允许一个异质者在你面前以他的方式自在存在，而不以精致的礼貌反复提醒他“我知道你不一样”——并没有发生。

将瑞典和日本放在一起，一个清晰的轮廓就浮现出来：社会心态的职业化不必依赖于某一类特定的政治制度。它可以在一个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善意社会工程中被培训出来（瑞典）；它也可以在一套高度成熟的社交礼貌体系中内生地自我维持（日本）。这两条路径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成功地让接纳变得安全到不需要付出张力承受。无论是瑞典的国家善意，还是日本的社交礼貌，它们都不是在打压接纳——它们是在让接纳发生的方式，从“在现场承受张力”被置换为“用一套标准姿态绕开张力”。接纳的动作总量没有减少，但接纳的发生条件被从根本上改变了。

2.3 发生条件的置换：从四个维度看职业化的微观传导

从上述两个案例出发，可以进一步辨认出一个更抽象的传导结构——社会心态的职业化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它沿着四个维度，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逐滴逐滴地渗透进社交微循环的内部，最终完成了接纳发生条件的整体置换。

第一个维度：话语技能对张力记忆的替代。 在瑞典的案例中，公共教育给了社区一套“正确对待残障邻居”的话语技能。这套技能极其好用——它让人们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有一套现成的反应可选，从而再也不需要面对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窘迫。

但话语技能的进入，同时挤出了张力记忆的练习机会。张力记忆不是靠培训得来的——它是一种被真实互动反复拉伸过的身体经验：在某一次真实互动中你不小心说错了话、被对方纠正、你感到尴尬但留了下来，在下一次互动中你比上次更知道怎么自然地反应。这套经验的累积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你必须真的处在那个没有现成剧本的情境里。而话语技能的熟练，恰恰消灭了这个条件——它让“没有剧本的情境”不再出现。

第二个维度：许可依赖对自发接纳的替换。在日本案例中，一个异质者能否在租房时被公平对待，并不取决于对方是否“真心接纳”，而取决于他的异质性是否被某个更高的权威——比如，跨国企业的工作证、知名大学的学生身份、本地担保人的签字——所预先背书。一旦有了背书，礼貌的接纳立刻启动，所有标准的关爱性问候全部上场；没有背书，就被一阵礼貌的、无法申诉的沉默笼罩。久而久之，社会成员就养成了一种接纳上的场景依赖：他们仍然具有接纳的能力，但这套能力只在“担保已到位”的场景下才被激活；一进入无担保场景，同一群人就会变得手脚僵硬，不知道该把接纳落实在哪个具体动作上。接纳的能力没有消失，但它变成了一件需要先拿到入场券才能穿的衣服——而入场券的发放权，不在社会自己手里。

第三个维度：对异质进行“安全提纯”的惯性。瑞典案例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去机构化改革之后，被送到普通社区的残障人士，往往是那些在官方评估体系中被认定为“适合正常化”的个案——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最需要被接纳的、最难被接纳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已经被预筛过一轮的、最容易被接纳的那一部分人。这不是一个恶意设计，这是一个无意的、自然的制度惯性：行政体系在面对“推广一种理念”的压力时，天然倾向于先推广最容易成功、最不容易反弹的那一批。但社会成员接纳能力的训练场，恰恰是由那些最不讨喜、最不便、最让人本能在第一时间想要回避的异质者提供的。当社会的制度机器年复一年地把“最需要被接纳的那个人”挡在训练场之外，留在场上的只是那些已经被提纯过的、安全的、不太会触发真实张力的“接纳练习题”——社会成员反复做着送分题，而真正的难题从未被摆在面前。接纳的姿态越来越准，接纳的力气越来越小。

第四个维度：“被看见的接纳”对“未被看见的接纳”的挤出。无论在瑞典还是日本，接纳一旦与某种社会表彰机制挂钩——无论是瑞典社区的“多元共融周”评优，还是日本职场中被私下称赞的“对谁都很体贴”——接纳行为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激励轨道：它越来越容易被那些能被他人看见、能被叙事化、能被计入某种社会信用的动作所占据，而那些发生在无人知晓的瞬时的、沉默的、不那么好看的真实接纳，则因为没有展示价值而逐渐被挤出。职业化的接纳是一种很容易被看见的接纳——它的微笑在脸上，它的正确的话在嘴边。真正承受张力的接纳则常常是丑陋的、沉默的、无表演性的——那个母亲在公园里憋了半天后说出的一句不怎么漂亮的“没关系”，不会出现在任何表彰叙事里。但恰恰是这些丑陋的、无表演的接纳，才是这块土地真正能长出异质之芽的土壤。

2.4 小结：一个被逼出来的新状态

社会心态的职业化，从发生学的眼光看，不是一块地突然“生了病”——它是在上述四个维度上的长期传导中被一步一步逼出来的一个新状态。它被逼出来的方式，是在每一个微小的互动节点上，让接纳变得安全、流畅、不被追究，从而让那个训练接纳即战力所必须的条件——面对面的、无剧本的、无法提前排练的张力承受——不再被反复提供。接纳的总产量没有下降；下降的是接纳所实际承受过的张力总量。换句话说，这片土地不是被挖薄了，它是在被反复浇灌话语营养的过程中，长出了一层不该长上面的假珊瑚——它不是土，但踩上去很硬；它不是活的，但看着很美。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种子，在这层假珊瑚上永远扎不下根。

三、接纳的即战力：从真厚到假厚的一条辨别线

上一节用瑞典和日本两个案例，把社会心态职业化的发生过程完整地走了一遍——看到了接纳的发生条件是如何在数十年间、在四个维度的传导中一步一步被置换的。但看到这个过程之后，一个更难的问题也浮了上来：我们凭什么说，发生在瑞典和日本的那个变化，是职业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比如，它不就是帕特南说的“厚信任衰退”吗？它不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社会资本耗散，套了一个新词而已吗？

本节的任务，就是直面这个质问，拉出一条不可还原的辨别线。

3.1 “接纳的即战力”——一个不可被换掉的辨别维度

社会心态的质地变化，如果只用存量概念来捕捉——比如“宽容度上升或下降”“信任厚度增加或减少”——将始终无法把本文所描述的职业化现象从已经被人说过的东西里剥离出来。瑞典的宽容度在上升，日本的社会礼貌极其发达——这两个社会在存量的各项指标上都表现得相当不错。但它们在面对一种特定情境时，却暴露出了同一种缺陷：它们接纳得住那些已经被主流叙事认证为“值得被接纳”的异质者，却接纳不住那些还来不及被认证的、最新生的、最笨拙的异质意愿。

这个缺陷不是存量的缺陷，它是一种能力的缺陷。具体地说，它是一种即战力的缺陷。

“接纳的即战力”这个概念，是要把一种此前夹在“态度”与“行为”之间、既不是态度也不是行为的灰色地带，精确地切分出来。我们可以先把它定义为：一个社会在面对一个未经事先认证、未被主流叙事收编、甚至有些让人不舒服的新异质意愿时，能够在多短的社交反应时间内、以多大比例、不垮掉地维持住基本接纳姿态——不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而是在第一个瞬间、在还没来得及想“我应该怎么反应才对”的那个瞬间，身体已经做出了不退缩、不回避、不转移话题的动作。

这个维度的辨别力在于，它同时砍向两边。一边是“库存式”的厚——一个社会的宽容话语库存再庞大，如果它的即战力很弱，它在面对一个不按剧本出牌的异质者时，第一时间给出的仍然是沉默、僵硬、或礼貌的撤退。态度调查测的是库存，即战力测的是前线部队的瞬时接触质量。一支军队可以拥有庞大的后备仓库，但如果前线部队在第一轮接触中就溃散，那些后备库存永远送不到战场上。

另一边是“态度式”的厚。社会心理学中已有的“内隐联想测度”（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测的是个体在实验室隔离情境下潜意识中的偏见强度。但“即战力”要捕捉的，不是实验室里的潜意识态度，而是在真实社交压力的弥漫性引爆下，接纳行为在第一个瞬间是否被瓦解。实验室里的内隐偏见，与真实互动中一个突

然的、不知怎么办的沉默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经验鸿沟。一个在实验室测出低偏见的人，在面对一个真实异质者的某个让他不舒服的非预期举动时，他的身体仍然可能在那个第一瞬间僵住——而这一僵，就是他接纳的即战力的真实天花板。“即战力”不是测“你有没有偏见”，而是测“当偏见被社交压力引爆时，你能否在第一时间用真实的接纳动作覆盖它”。

这种能力，与帕特南笔下“厚信任”的衰退不是一回事。帕特南描述的厚信任衰退，指的是人们在长期、密集、反复的面对面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深度互信，因为通勤时间延长、居住隔离加剧、独处娱乐替代集体活动而逐渐稀释。厚信任衰退的直接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稀薄——人们更少一起做事、更少彼此托付、更少在危急时想到“我可以去找谁”。但厚信任衰退不一定带来接纳行为的“职业化转向”。一个信任稀薄的社会，在面对异质者时可能表现出冷漠——不说话、不接触、不关心。这种冷漠是真冷漠——它不假装热情，不表演欢迎，不提供一套滴水不漏的正确话术。它是一种诚实的、未加修饰的接纳缺失。

而职业化接纳则相反——它不冷漠。它热情，它周到，它的微笑在触发前就已经到位了。冷淡社会的接纳缺失，是不给；职业化社会的接纳缺失，是用一套给得极其标准、极其流畅的程序，替代了给的时候本该承受的那个张力。帕特南没有区分这两种缺失——他笼统地讲“社会资本衰退”，这就把“人们不参与”和“人们参与但只在安全剧本里参与”两件质地完全不同的事混在了一起。本文的“即战力”概念，恰切开了这个帕特南没有切开的区分面：一个社会的接纳行为的输出总量可能完全不变——甚至上升——但接纳发生时所承受的单位张力量却在系统性地下降。

如果用一句可以钉死在墙上的话来说：“接纳的即战力”追问的不是“接纳有多少”，而是“接纳能不能在第一个瞬间，接住一个它不认识的、还没被训练的、还没学会怎么让自己显得值得被接纳的异质意愿”。这个能力，帕特南没谈过，社会资本文献没测过，内隐联想量表没触及过。它是一个不可被替换的新辨别维度。

3.2 从延性到脆性：土壤的质地变化

职业化风土对权利发生的最隐蔽的伤害，是它在接纳即战力衰退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种看似相似、实则致命的材料特性变化。

在材料科学中，有一种现象叫“韧脆转变”——某些材料在特定条件下，其断裂模式会从延性（缓慢变形、大量吸能后破坏）突然转变为脆性（几乎无形变、瞬间断裂）。将其平移到社会心态分析中——这只是一个类比，借其结构而非借其术语——我们可以看见类似的结构性转变：接纳从一个延性材料，慢慢变成了一种脆性材料。

延性的接纳，来自身体在长期与异质共处中被反复拉伸过的经验。每一次与异质者的别扭、沉默、甚至争吵，都像是金属材料的一次冷加工——当时不舒服，但它改变了接纳的内部微结构，让别人下一次再面对类似张力时，能够承受更大的变形而不破裂。在瑞典去机构化改革的头几年里，社区里发生的那些真实的尴尬、真实的皱眉、真实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它们就是那一轮冷加工。它们让那个社区接纳的延性增加了。

脆性接纳则相反。它的表面硬度极高——话语层面可能比延性接纳更强硬、更正确——但它的内部微结构没有经过任何拉伸经验的填充。当瑞典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公共教育用一套标准话语覆盖了社区，让每一次超市里的相遇都沿着“微笑—问候—转入日常”的剧本安全运行，那些真实的尴尬就不再被提供了。接纳不再被冷加工。它变得越来越流畅，也越来越脆。一个残障邻居如果在超市里按剧本行动——点头，微笑，接一句无关痛痒的问候——那么他会被完整地接纳；但如果有一天，他在超市里做了某件不在剧本里的事——比如，他突然大声地、不合时宜地讲起一件困扰了他很久的事——那个瞬间，周围人的接纳可能不会慢慢变形，而会直接断裂：不是从微笑变成皱眉，而是从微笑变成消失。没有人会对他发火，但所有人都会在那一个瞬间找到各自撤离的理由，而那个理由是那么自然、那么下意识、那么不需要被任何人追责——“我正好要赶去那边”。

这就是脆断。脆断的可怕不在于它的粗暴，而在于它的无从申诉。老张不能去法院起诉“邻居不来了”，残障者不能去投诉“超市里的人突然有事走开了”。接纳的撤离没有留下痕迹。它不是由某项禁令触发的，它是被那个异质者自己的“不在剧本内”的存在触发的。而一个社会如果走到了这一步，权利清单上的“法无禁止则自由”就变成了一份空转的公证——它证明了你是自由的，但不保证你自由的那一刻有人在场。

3.3 在什么意义上“假厚”是新的

回到审稿人最严厉的那个质问上来：你说社会心态从真厚变成了假厚——好，“假厚”这个词，到底比“没以前厚了”或者“社会变了”多出了什么？

多出的是对一个特定性质变的识别。瑞典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状况，不是“没以前厚了”——在宽容话语的流通量、残障者被口头问候的频率、社工回访满意度调查的结果上看，它比七十年代更“厚”。但它的内部质地，已经从一种能承受真实张力的延性材料，变成了一种只能在剧本范围内安全运作的脆性材料。“假厚”就是给这种特定质变的一个工作定义：话语层厚度的上升，与身体层承受力的下降，同时发生，并且前者是后者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不是因为话说得太多了所以累了，而是因为话说得太正确太安全了，以至于那个“承受张力”的练习机会被系统性剥夺了。

这个质变，旧有的概念是抓不住的。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衰退”只能抓下降，抓不住“一边上升一边下降”的结构性背反。“文化工业”只能抓文化生产端的安全化，抓不住社交互动端在标准话语浇灌下发生的身体变化。“目标置换”只能抓组织规程对实质目标的替代，抓不住一场全社会范围内的、不依赖科层指令的去中心化置换。因此，“假厚”不是一个修辞，它是对一种特定背反现象的精确命名：当接纳的发生条件从面对面张力承受被置换为标准化剧本演练时，社会心态的厚度就会在存量和产量上保持甚至增长，在即战力上发生脆性坍塌——这种状态，就是假厚。它就是真厚在制度善意与社交礼貌的双重浇灌下，被一点一点逼出来的那个变体。

四、权力的新面相：它不是在杀异质，它是在让接纳异质变得安全到不需要承受

辨识出社会心态职业化的发生机制之后，权力的场态渗透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改变意愿气候”的模糊概念，而获得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机制性内核：权力系统不是直接在打击异质——那太费力、也太容易留下把柄——它是在系统性地为接纳的发生条件置换提供“培训服务”。它不是手把手地教人们不要接纳，它是年复一年地、以善意到不可挑剔的方式，把接纳所必须依赖的那个条件——无剧本的面对面张力承受——从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稀缺。

4.1 四个培训方向

权力的场态渗透至少从四个方向上加速了接纳发生条件的置换。

第一，它垄断了对“值得被接纳的异质样本”的筛选权，从而在源头上决定了社会成员的接纳即战力会被什么样的异质者训练。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异质意愿：有些已经比较成形，有些还是模糊的骚动；有些温和，有些激烈；有些容易被主流叙事收编为“多元化的魅力样本”——比如一个在逆境中坚持非遗手艺的独居老人——有些则因为其不讨喜、不方便、或挑战太锋利的特性而天然难以被收编。在真厚风土里，这种筛选是由分散的、独立的、无数小社群在各自的地盘上分别完成的——没有一个中央处理器来预先决定哪一种异质值得被看见。但在职业化风土里，权力通过其控制的公共平台——主流媒体、教育体系的榜样塑造、各种评优评奖——逐步成为那个事实上的“总编辑”。它不直接说“这种活法不对”，它只是不表彰它——不拍它，不让它进“感动人物”候选名单，不让它在年终巡礼里有一个三分种的片段。于是，能被社会轻易看见的异质样本，就被预滤了一轮：留下来的都是那些最安全、最容易被主流叙事收编的样本。而社会成员，日复一日地只看见这些安全样本之后，他们的接纳即战力就会进一步退化——因为他们的接纳肌肉，从未被那些真正需要承受张力的异质者训练过。他们训练的对象，一直是被权力系统事先“驯化”过的、安全版的异质者。这就像是用塑料制成的轻哑铃来练肌肉——动作越来越标准，

力气却越来越小。与“文化工业”的诊断不同：这里的问题不只在“异质样本被工业化地安全化了”，而更在于社会成员的接纳能力在被这些安全样本长期喂养之后，内部微结构发生了无法逆转的脆化。

第二，它在“被担保的接纳”与“无担保的接纳”之间制造了一种隐性等级，从而使接纳即战力发生严重的场景依赖。当一个异质者进入公共视野时，他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被看见的，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被接纳的质地。如果他是在官方表彰的语境下被看见的，那么社会对他的接纳是有担保的接纳——接纳他不仅没有社交风险，还能给接纳者带来“我也是一个开明的人”的道德奖励。反之，如果一个异质者是绕过官方叙事、自己闯进来的——比如一个在社交媒体上自行发声的、其诉求不那么容易被收编进主流叙事的人——他面对的就是无担保的接纳：接纳他，没有任何预装的道德奖励；接纳者需要自己承担“万一这个人不对呢”的全部社交风险。职业化风土里，这两种接纳之间的裂谷被权力系统持续加固：前者被反复给予荣誉性的可见度，后者则被沉默地晾在没有灯光的地方。久而久之，社会成员的接纳即战力就发生严重的场景依赖——在有担保场景中，他们可以是完美的接纳者；一旦切换成无担保场景，同一个人的接纳能力就急剧塌缩，他退回到那套最安全的“我支持你的权利，但请注意方式”的话术里。这种场景依赖是职业化接纳的典型病理：它像一个在标准赛道上跑得飞快的短跑运动员——但赛道必须平整、必须事先划线、必须有发令枪；一遇到野地，他连跑都不敢跑。

第三，它用“安全许可证”的逻辑替换了接纳的社会记忆。真厚接纳的底层支撑，是一个社会对“有些事虽然让人不太舒服，但它是允许的”这件事形成了长期记忆。这种记忆是分散的、身体性的、由无数具体事例组成的——一个社区接纳过一个说话刺耳的邻居三十年，这件事不需要任何官方认证，因为它被活过了三十年。职业化的过程，则是权力系统逐步用一套“安全许可证”制度来替换这种社会记忆。在安全许可证的逻辑下，每一个异质行为，在被社会大众普遍接纳之前，必须先获得某种形式的默许——可以是一次未被删的报道，可以是一次被“倡导”的风向，也可以只是一次未被叫停的小范围尝试。一旦许可证发下来了，社会就可以安全地接纳；没发下来，大家就等着。等久了，“等待许可”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习惯——取代了以前

那种“先试试看，没人拦就继续做”的古老直觉。接纳不再是一个社会自发进行的、去中心化的身体实践；它变成了一个等待被中心授权的话语事件。权力从不拒绝发这张许可证；它只是让它发得足够慢、足够不可预测——不是要禁止，而是要让一切保持在“需要被许可”的状态里。一旦社会习惯了这种状态，权力的场态渗透就完成了它最隐秘的一步：用许可替代了记忆。

第四，它把“不接纳”变成了社会成员的无形职业倦怠。权力不需要训练公民去不接纳，它只需要让接纳变得足够累。在职场上，职业倦怠的典型病理是：一个助人行业的从业者，日复一日地按流程对服务对象表达共情，但流程不允许他真实地介入对方的生活，也不允许他真的被对方的痛苦所改变。时间一长，他就会发展出一种精确的、耗能的表演性共情——表面上一切合规，实际上灵魂已经退场。社会心态的职业倦怠，遵循的是同一种病理逻辑：当接纳被反复框限为一套必须正确演出、却不能真介入异质者命运的流程时，人们会在无意识中逐渐耗竭。但这不是一般的“疲劳”——不是因为接纳做得太多而累，而是因为接纳得太正确、太安全、太不被异质真正碰到而累。就像法学生反复练习同一套案例分析，格式越写越标准，但从未上过一次法庭——他不是练得太苦，他是练得太空，最后在法律意见书的格式完美中再也找不到当初选这个专业的理由了。

这种倦怠累积到一定程度，社会成员就会在尚未表态之前，就已经累了——累到没有力气去注意那一个还笨拙、还不讨喜、还需要有人冒险先接住它的新生异质意愿。于是，在名义上完全自由的社会空间里，到处弥漫着一种礼貌的累：没有人禁止你做什么，但也没有人在乎到有力气接住你。这种累，是职业化风土下权利最无望的死法。

4.2 权力自律的实质：戒断那种想去修剪的冲动

如果上述诊断成立，那么权力的自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不越过授权清单”的消极义务。授权清单管的是权力不能直接“做”什么——不能禁止、不能处罚、不能强行铲除。但权力还有另一种更难被约束的惯性：它不铲除异质，但它太想修剪异质。它太想把社会培育成一个漂亮的盆栽——不是用斧头砍掉什么，而是用剪刀，轻轻地、持

续地、关怀备至地，把每一枝长得“不太合群”的嫩芽修掉，让整个盆栽看起来和谐、饱满、在任何一个角度拍照都挑不出毛病。

做盆栽师比做监狱长更难戒。监狱长容易被识别为压迫——他自己也知道他在压迫，他会掩饰，会在压力下退让。但盆栽师完全不同：他真心觉得自己是在养护这片林子。他修掉那些“长得不好的”枝条，是为了整棵树能长得更好。他没有恶意，他甚至带着爱。问题是，权利的发生，恰恰依赖那些“长得不好的”枝条。那些长歪的、太快的、刺眼的、难以归类的枝条，往往就是下一个权利样本的雏形。当权力以“养护”之名把它们修掉时，它没有越出任何一条授权清单的红线，但它掐断了权利发生最不可替代的前锋资源——那个还来不及被认证、还来不及学会“如何让自己看起来值得被接纳”、以最原始的样子闯进世界的意愿。

因此，权力的自律，在职业化风土的语境下，必须被重新理解为一个远超制度合规的命题。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程序关卡来审查权力的“动作”——那些关卡对盆栽式修剪近乎失明，因为每一次下剪都太轻了，轻到不值得被记录。它需要的是一种权力对自身“养护冲动”的深刻戒断：承认自己不是这片森林的园丁；承认有些枝条长出来会刺眼、会破坏景观的和谐、会让管理员在上级视察时感到难堪，但它们有权利长在那里——不是因为它们已经被认证为“有用”，而是因为它们先于任何认证而存在。

这种戒断在实践中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件事：权力在面对一个未被主流叙事收编的、甚至让权力自己感到不适的新生异质现象时，能够在最初的那种冲动下——那种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想去“引导引导”、想去“规范规范”的冲动下——把自己按住。按住不是不作为，而是让那个现象自己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权力不把它纳入任何榜样列表，也不把它纳入任何问题清单。它只是一个还在长的东西。第二件事：权力必须撤回那种替社会提前判定“这个大概不会流行”的惯性。很多异质意愿之所以没机会被社会检验，不是因为社会接不住它，而是因为权力在传播的上游就替社会决定了“这个不值得接”。如果权力能从这一步撤回，让那些意愿自己去试试——自己去撞，自己去活，让社会在自己的社交微循环里决定接不接——那么，接纳即战力最不可替代的训练场，就不至于被系统性地剥夺。

五、法在此刻的任务：拆除那套正在泵送职业化的系统

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呼吁“养护社会土壤”的论述，走到最后都会滑向一种温柔的无力——告诉人们要多一点善意，少一点冷漠，在日常中多接住彼此。这些呼吁没有错，但它们独自不足以构成一个经得起反驳的公共判断。因为它们回避了一个最难堪的问题：如果土壤已经在职业化，如果接纳本身已经变成了一套标准化表演，那么“多一点善意”恰恰是职业化最擅长供应、也最无法改变任何实质的东西。善意越多，表演可能越精致，接纳的即战力可能反而越衰退。瑞典八十年代的社区如果听到一句“大家要多一点善意”，他们会诚恳地点头——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有善意。他们缺的不是善意，而是善意不再与张力承受捆绑的缝隙。

因此，法在此刻的任务，不能被浪漫化为一纸“社会风尚促进条例”。法律不能直接制造厚土——任何尝试用法律条文去规定“社会的理所当然感应该长成什么样”，其本身就是对土壤的暴力。但法律可以做到一件事：它可以拆除那套将接纳的发生条件从身体共在扭向话语表演的泵浦系统。它不能命令人们重新练习承受张力，但它可以停止那些让人们不需要承受张力的制度性培训。

具体而言，这项拆除工程可以沿着两个方向展开。这两个方向都不追求直接加厚土壤，而是追求掐断职业化的加速器——它们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加法。减法做完之后土壤能不能厚回去，要看社会自己的生命；但至少，它不会再被持续地往假厚那个方向泵送。

第一个方向：对权力倡导权的结构性收缩。当代公权力有一个普遍特征：它越来越不能容忍在主流价值叙事之外，还存在未被它主动评价过的社会生活领域。它不一定要去禁止什么，但它很难忍住不去“倡导”什么、“引领”什么、“弘扬”什么。每一个没有被它倡导过的生活方式，都等于被被动地放在了“不被倡导”的阴影里。在职业化风土中，这种阴影就足以致命——因为职业化接纳主要靠“有无担保”来启动，而权力的倡导就相当于社会中最重的那一档担保。

要切断这个加速机制，只需要一项极其简单、却在实践中极难坚守的自我约束：权力在行使倡导权时，必须同时明确承认，它所不倡导的选项同样是合法的、受同等保护的。这条规则的实质，是要求权力每次开口鼓励一种活法时，都必须同时割断“倡导A”与“暗示非A不受欢迎”之间的那条隐性滑坡——那条通向隐形禁令的最常用的便门。与此同时，在那些涉及个体生活方式最深层选择的领域——职业、居住、亲密关系、信仰表达——权力应当更进一步，明确放弃以“倡导某一种选项”的方式来行使治理。如果某件事被法律保留为个人自由的领域，那么权力就不应当把那只“看不见的手”伸进去——哪怕伸进去的时候戴着一副“我只是倡导一下”的白手套。在这些领域里，权力的责任是维护自由行使的骨架——禁止歧视、提供救济路径、惩罚强制，而不是“培育风气”。风气，在这些领域里，应当被明确地认定为社会自治的保留地。

第二个方向：切断行政资源与生活方式合宜性之间的所有隐性挂钩。在职业化风土中，很多人在做出异质选择时被卡住的，在法律上不是“不被许可”，而是在各种行政窗口、审批流程、社区服务中遇到的非正式降温：材料“建议再补一份”、窗口人员一句“你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或者在该发放资源时被善意地建议“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这些动作，单独看没有一个是违法的，但它们合在一起，就是权力以场态渗透的方式在编织安全许可证的网。

要切断这种挂钩，不能仅靠事后个案的诉讼救济——这种降温动作的特性恰恰在于，它根本没有留下可诉讼的痕迹。必须在事前，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在行政程序的默认设置中把“自由证明”的责任从公民肩上摘掉。具体而言：在任何一个涉及个体生活方式的行政程序中，只要该生活方式本身并不被法律禁止，行政人员就无权以任何形式对该生活方式本身的“合宜性”做出倾向性评价或建议。如果行政人员做出了这种评价，其所在机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非公民自行举证），且该评价本身应被行政程序规则明确列为程序瑕疵的一种类别。这一制度收缩的实质，是将“不评价公民生活的合宜性”从一项不成文的行政伦理，升格为一项刚性法律义务。

这两项收缩——对倡导权的约束、对隐性挂钩的切断——加在一起，不能直接加厚土壤。但它们能做到一件更紧迫的事：拆除那套一直在加速土壤职业化的泵浦系统。权力不再以倡导之名行修剪之实，不再以服务之名行过滤之实，不再以关怀之名行降温之实。一旦这套泵浦被关上，社会心态就不再被持续地往职业化方向挤压——它能不能恢复即战力，要靠社会自己的生命；但它至少不再被制度性地训练成脆性材料。

六、与情感劳动、拟剧论的对质：这场表演是谁雇的

“接纳的即战力”若要站住，必须先接住两个离它最近的既有框架，而本文前几节尚未正面处理它们。

第一个是霍克希尔德的情感劳动。《被管理的心》（Hochschild, 1983）精确地描述了空乘、护士、收银员如何被组织要求生产特定情感，并区分了“表层扮演”（做出表情但内心未动）与“深层扮演”（调动内心以真的产生那种感受）。本文所说的“职业化接纳”——热情、周到、微笑在触发前就已到位——几乎就是表层扮演的社会版。差别在雇主。情感劳动有一个明确的雇主、一份工资、一本规则手册，以及一条清晰的下班线：脱下制服，表演即止。本文追踪的置换没有雇主。它发生在没有人付钱、没有人考核、没有人规定台词的日常互动里——在邻里之间、在同事的饭局上、在一次陌生人的搭话中。没有雇主而剧本仍在，这正是本文所要命名的那件事：接纳的发生条件被置换之后，剧本不再需要外部强制来维持，它已经变成了“正确”本身。可裁决差别由此得出：情感劳动理论预测，在完全脱离组织约束的私人场合，表层扮演会显著回落，人会“做回自己”；本文预测回落不会发生——在私人场合面对一个突然的、不合剧本的异质意愿时，那个僵住的瞬间照样出现。取同一批受试，分别在职业场景与纯私人场景中测量首次反应潜伏期与回避行为发生率，两者若在私人场景显著改善，本文被削弱。

第二个是戈夫曼的拟剧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Goffman, 1959）主张一切互动本就是前台与后台的表演，人从来不是“赤裸”地相遇的。若接受这个前提，“接纳变成表演”似乎不是新事，而是人类互动的常态，本文的“质变”说法就

落空了。本文的回应是：戈夫曼描述的是表演的普遍结构，本文描述的是某一个特定动作的发生条件的历时置换。前台与后台的区分本身不含时间指向，它对十七世纪的乡村与二十一世纪的都市同样适用；而本文主张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弥散的社交曝光、可追溯的言论记录、道德判定的即时化），“接纳”这一个动作从“承受张力的身体记忆”被换成了“规避张力的规范性剧本”。这是一个可以被时间序列证伪的主张：若在社交曝光度显著不同的两类社群中（例如高度在线社群与低网络渗透社群），接纳的即战力指标没有系统差异，则“置换”并非历时发生，戈夫曼的常态解释足以覆盖，本文应被放弃。

最后要说明与内隐联想测验的关系。IAT 测的是隔离情境下的潜意识联结强度，本文测的是社交压力被引爆的第一瞬间、身体是否用真实的接纳动作覆盖了那个联结。两者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分离：一个 IAT 低分的人完全可能在真实互动中僵住，一个 IAT 高分的人也完全可能凭训练有素的剧本给出流畅的正确反应——而后者恰恰是本文所说的“假厚”。若实证显示 IAT 分数与首次反应潜伏期高度相关（ $r > 0.7$ ），则“即战力”不构成独立维度，本文的核心命名失去存在理由。

七、与技能获得理论的对质：即战力是熟练，不是态度

「接纳的即战力」最容易被读成一种态度的强度——好像它只是宽容度的一个更急躁的版本。前面已经把它与库存式的厚（态度调查）和实验室里的内隐偏见切开，但还欠一个正面的定位：如果它不是态度，它是什么？

德雷福斯兄弟在描述技能获得时给出过一个五阶段模型：新手依赖脱离情境的规则，胜任者开始按目标筛选线索，而**专家的标志恰恰是不再有意识地应用规则——他直接看见情境要求什么，并在有意识的判断介入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回应**。他们特别强调一件事：让一个专家把自己的动作还原成规则去执行，他的表现会倒退到胜任者水平。

这个结构可以直接承载本文的核心判断，而且比厚土的隐喻承载得更精确。接纳的即战力不是态度库存，它是一种**社会层面的熟练应对**：在一个未经认证的异质意愿突然出现的瞬间，身体在有意识的正确性计算介入之前就完成了不退缩的动作。而社会心

态的职业化，用这个模型说，就是把整个社会的接纳能力从专家阶段按回到规则阶段——人们不再直接看见眼前这个具体的人要什么，而是先检索「面对这一类人，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再执行检索结果。剧本越完备，检索越流畅，倒退越彻底。

这一咬合带来两个前文给不出的推论。

第一，它解释了为什么职业化的接纳在典型情境中表现更好、在非典型情境中反而崩溃。规则阶段的优势正在被规则覆盖的情境里：面对一个已被主流叙事认证过的异质者，剧本反应比笨拙的真实反应更得体、也更少伤害。但当出现一个剧本没有条目的意愿时，专家能直接应对，规则执行者只能沉默、僵硬或礼貌地撤退——这正是本文所描述的那种热情而空洞的接纳缺失。

第二，它给出一条可裁决的分离检验。若即战力只是态度强度，那么在典型与非典型两类情境中，同一群体的接纳表现应当同向变化。若它是熟练度，两类情境会分离：**接受过多轮多元化培训的群体，在典型情境中的接纳分数上升，在非典型情境中的首次反应潜伏期反而延长、话题转移率反而上升。**测量工具就是本文前面给出的那一组，只需按情境的剧本覆盖度分层。奥尔波特的接触假说预测培训与接触普遍改善接纳；技能模型加上本文的判断则预测一个交叉：典型情境改善，非典型情境恶化。

限度也要说清。德雷福斯模型处理的是个体技能，本文把它移到社会层面，需要承担一个额外假设——社会的接纳能力不是所有个体能力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共享的默认反应剧本所调节的。这个假设本身可错：如果分层测量显示非典型情境中的恶化只出现在少数个体身上、与群体层面的剧本密度无关，那么本文的社会层面命题就应当被收回为一个个体心理学命题。

八、本文禁止什么

观测量。（1）“首次反应潜伏期”：面对未经认证的异质意愿时，从刺激出现到出现明确接纳动作（继续对话、身体朝向不变、追问）之间的秒数；（2）“撤退率”：在同一情境中出现转移话题、沉默、身体转向等回避动作的比例；（3）“库

存指标”：常规宽容度问卷与社会信任量表得分。三项须在同一批被试上同时测量，编码由不知晓假说的两名观察者独立完成。

本文禁止以下情形出现。 第一，禁止“库存指标与即战力指标同向且高度相关”：若一个社会的宽容度问卷得分能可靠预测其首次反应潜伏期，则“假厚”不是一个独立现象，态度调查已经足够，本文的整个辨别线失效。第二，禁止“在禁止令与授权清单均无变化、且即战力指标稳定的条件下，自由行使范围仍显著收缩”：若如此，收缩另有原因，本文归因于风土质变的解释被推翻。第三，禁止把任何一次冷淡都算作职业化：本文明确区分冷淡社会（不给）与职业化社会（给得极其标准），前者不构成本文的证据。

本文不主张什么。 本文不主张宽容规范、反歧视训练或礼貌本身是坏的——它们各自解决了真实的问题，本文只主张其中一条路径（把接纳从身体承受改造为剧本执行）带有一项未被计入的代价。本文不主张存在一个可以回去的“真厚”黄金时代：瑞典与日本的材料被使用，不是为了证明它们比过去差，而是为了证明高存量与低即战力可以并存。本文也不主张法律应当直接规制社交互动——第五节的落点是拆除那些持续把接纳推向表演的制度性泵浦（记录化、可追溯化、即时道德判定的制度激励），而不是要求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相处。

九、诚实的边界：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判断是错的

任何试图做出经验判断的论证，必须在最后诚实地交代：它在多大范围内有效，在哪些条件下将被推翻。以下是本文核心命题的六条证伪路径。

第一条：如果职业化效应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后不独立存在。本文假定，社会心态的职业化——接纳发生条件从身体张力承受到标准剧本演练的置换——对自由的实际享有有独立于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信息自由度的解释力。如果在严谨的比较研究中，用“接纳即战力”的操作性指标（接纳行为在无担保场景下的脆断加速度、接纳的场景依赖度、话语接纳与身体接纳的脱钩程度）控制住上述变量之后，发现职业化

程度的差异无法解释自由实际享有的任何增量变异，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应当被大幅收窄为一则仅适用于特定文化圈的地方性观察，而不是一个普遍机制。

第二条：如果接纳的即战力可以被制度直接补足而不需要土壤的质地转变。 本文认为，制度只能做间接的事——拆除泵浦系统、约束权力倡导权、切断隐性挂钩。但如果未来某个法域的制度实验证明，通过极其精密的权利救济设计，一个接纳即战力极差的社会仍然能够让异质意愿在实际生活中被有效而持续地行使，且这种行使的质与量不弱于一个真厚社会水平——这就意味着，本文对“法所能做的仅限于间接之事”的判断过于保守。接纳的即战力可能不是权利发生的唯一通路，它只是诸多通路中最常见的那一条。

第三条：如果社会心态的假厚可以不经由权力的场态渗透而自主逆转。 本文在第四节将权力的场态渗透诊断为加速职业化的主要外部推手。但如果能证明，一个社会的职业化状态在没有权力主动推动的条件下——仅凭社交媒体算法、代际生活方式更替、或中产阶层的地位焦虑——也能发展到同等强度的“假厚”并长期自持，那么本文对“权力自律”作为优先策略的强调就需要重新配权。问题可能比本文诊断的更弥漫、更难以通过约束单一行动者来解决。

第四条：如果异质意愿的退潮实质上对自由没有造成本文所断言的那种深重伤害。 本文整个论证都建立在一个可能被质疑的价值预设之上：一个社会的自由质地，应由其可实际行使的异质选项的丰富性来衡量，而不只是由法律文本的禁止清单长度来衡量。如果这个标准本身被证明在经验上不可操作——例如，我们永远无法可靠地区分“人们不做某件事是因为他们被职业化风土冻住了意愿”和“人们不做某件事是因为那个意愿本身自然地、健康地消退了”——那么本文的诊断将缺乏可观测的判据，并从一种发生学分析退化为一种不可证伪的修辞。这个挑战，我将在下面专门处理。

第五条：如果“职业化”本身就是真厚在超大规模社会中的必要生长形态。 这是本文必须面对的最根本的反对意见。一个由数以亿计、彼此素不相识的人组成的庞大陌生人社会，不可能再靠小圈子的身体记忆来维持接纳——它必须发展出一套标准化的、可复制的、不依赖特定个人在场的接纳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描述的那种“从

身体记忆到话语技能的蜕变”，也许恰恰是接纳能力在大规模社会中的进化而非退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本文赋予“假厚”的负面判断就需要被清算——它可能只是一个习惯于小共同体道德直觉的观察者，在面对大社会不可避免的形态变迁时流露出的一种怀旧式的立场。本文对此的回应是：即便标准化是必然的，标准化本身也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走向。一种走向，是标准化作为身体记忆的“外置储存”——它辅助张力承受，但不替代练习本身；另一种走向，是标准化作为张力承受的“豁免许可”——它让人们绕过张力承受而仍然获得接纳的道德奖励。前者仍能维持接纳的即战力在一个虽有限但仍可再生的水平，后者则直接切断即战力的训练通路。本文的诊断不指向前者，只指向后者。大规模社会是否必然滑向后一条路，在经验上仍是一个开放问题——而非一个先验的、不可反驳的结论。

第六条（最致命的一条）：凭什么说那个意愿是被冻住的，而不是它自己本就不值得被接住？这是本文必须正面面对的挑战。它不需要否认职业化现象可能存在，只需要指出：本文所举的那些被用作证据的“意愿退缩”案例——老张没人来的广场、大龄青年不再努力找伴侣——完全可以用正常的社会选择过程来解释。老张的那个议题可能确实没什么讨论价值；那个没结婚的人可能就是真心想单身；邻居们可能确实是真的有别的事。如果“职业化造成的退缩”和“正常的社会意愿淘选”无法被分开，本文的整条经验判断就都无从立足。

本文目前的回答是诚实的：这一步区分，在方法论上确实还没有被完全攻克。要判定一个异质意愿到底是“被冻住了”还是“自然消退了”，目前手上有一些初步的辨异信号，但还没有能够系统编码的判据。

第一个辨异信号，是意愿退缩的“脆断加速度”——一个意愿如果是因为职业化风土而退缩，它的退缩通常不是渐进的、在多次受挫后慢慢消退的，而是在一两次“被彬彬有礼地放回安全距离之外”之后就急剧退潮。这个突变的斜率，在原则上是可以区别于“长期多次尝试后缓慢降温”的自然消退的。但这个信号的可靠性依赖于我们能否追踪到个体意愿退潮的微观时序——而这在社会层面的大规模观测中是极难做到的。

第二个辨异信号，是意愿退缩的“告知-退缩脱钩”——职业化冻住的意愿，通常有一个典型模式：当事人获得了大量“你应该勇敢做自己”的话语鼓励，但在每一次试图把那个自己端出来的具体时刻，发现没有人真的在听。这种“话语热烈、身体缺席”的脱钩，是职业化风土的独特签名。一个自然消褪的意愿，话语鼓励 and 身体参与通常会同步降温——没有人再鼓励你，也没有人再来参与，意愿就此静默。两种模式在“话语与身体的退潮是否同步”这个维度上，方向是相反的。

第三个辨异信号，是“同类异质者的替代性存活情况”——如果在同一个社会时段里，存在与退缩意愿在“被主流叙事收编的难易度”上不同的同类异质者，而收编难度高的那些普遍退缩、收编难度低的那些普遍存活，这种系统性的存活-退缩剪刀差，就构成了一个有力的旁证：退缩的原因不在于意愿本身没有价值，而在于它拿不到安全许可证。

这三个辨异信号在逻辑上可以切割出职业化退缩与自然淘选的区别，但它们在操作化上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方法论研究。本文诚实地承认这一局限——但同时也指出，这一局限并不独属于本文。任何试图在宏观层面论断“某种社会心态导致了某种行为模式的变迁”的理论——包括社会资本衰退论、文化工业批判、甚至某些版本的新制度主义——在“如何把正常个体选择与结构性压制区分开”的问题上，都面临着同等程度的方法论困难。本文的贡献，不在于已经解决了这一困难，而在于为这一困难提供了一个比既有概念更精确的切入面——从“存量的增减”切入了“发生条件的置换”；从“宽容度下降”切入了“接纳的即战力衰退”。这个切入面本身，就是本文不可被既有概念组合替换的理论收益。

以上六条，是本文核心命题被证伪的六条路径。在它们被有力地满足之前，本文坚持“社会心态的职业化”——接纳发生条件从身体张力承受到标准剧本演练的系统置换——是一个不可被帕特南、文化工业或目标置换等既有概念所替换的辨别维度。在它们被满足之后，本文应被诚实地收回。

注释

- [1] 本文从组织社会学对“职业化”的经典分析中获得了重要的类比灵感，尤其是在“目标置换”与“程序合规替代实质判断”这一机制脉络上（参见Merton 1940; Selznick 1949; Wilensky 1964; Larson 1977）。这些研究揭示了专业团体和组织在职业化过程中发展出标准化操作规程，从而可能导致从业者个人判断力与在场承担能力的弱化。本文在类比意义上将这一机制从组织层面移至社会心态层面，用以描述整个社会对异质意愿的接纳从身体张力的承受转变为标准话语的表演。需强调的是，此处的“职业化”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专业化或技能提升，而是特指一种发生条件的置换：接纳的发生点，从“具体、偶然、充满张力的面对面互动”被挪移到了“抽象、可预期、规避张力的规范性剧本”上。
- [2] 本文借用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56）“前台/后台”的分析框架，但将其分析单元从个体面对面对互动延伸至社会层面的公共话语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分裂。在职业化风土下，接纳行为在前台极其熟练、滴水不漏，在后台则急剧衰竭——这种双重性，可以用经过延伸的前台/后台框架来精确描述，但本文的核心机制（发生条件置换）并不依赖戈夫曼的框架作为一种解释，而仅借用其描述精准度。
- [3] 本文在引言部分提及福柯的“治理术”与布迪厄的“惯习”，并非要对二者做完整的理论评述，而是为了廓清本文所诊断的现象与这些已被理论化之机制的区别。“治理术”预设了一种对主体行动领域的积极塑形，本文侧重的是在不直接施加指令的情况下发生的集体性接纳能力内部质变。“惯习”预设了内化的一致性，本文恰要揭示的是习得的标准姿态与真实身体反应之间的分裂。
- [4] 本文第二节中的瑞典与日本案例，素材来源于多个公开可查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观察，包括但不限于：瑞典去机构化改革的政策文献与历史研究（Tøssebro et al., 1996,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he Nordic Welfare States; Grunewald, 2003, From the Inside: Personal Stories from the Institu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Normalization）；日本社会对异质者态度的文化社会学分析（Lebra, 1976, Japanese Patterns of Behavior; Sugimoto, 2014,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ociety; Milly, 2014, New Policies for New Residents: Immigrants, Advocacy, and Governance in Japan and Beyond）。这些案例在本文中经综合、简化与匿名化处理，其功能是以具象方式展示社会心态职业化的发生过程，而非提供普遍性的经验证明。
- [5] 本文提出的“接纳的即战力”概念，其经验操作性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第六节中提出的三条辨异信号——脆断加速度、告知-退缩脱钩、同类异质者替代性存活情况——在逻辑上可切割出职业化退缩与正常社会淘选的区别，但尚需进一步的方法论研究才能转化为可系统编码的观测指标。本文已将“无法区分职业化退缩与自然消褪”列为本文最核心的证伪条件之一，坦诚面对这一挑战。

参考文献

Adorno, T. W., & Horkheimer, M. (1947).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Querido.

- Bourdieu,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Foucault, M. (2004).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Seuil.
- Goffman, E. (1956).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 Larson, M. S.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erton, R. K. (1940).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18(4), 560-568.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elznick, P. (1949).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Formal Organ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ensky, H. L. (1964).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2), 137-158.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 Dreyfus, H. L., & Dreyfus, S. E. (1986).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Free Press.

三种读法 · 网页长文 · 在线 PDF 翻页 · PDF 下载

[返回 高鹏 全部作品 →](#)

本文由作者借助 SDE 金点子发生器完成思想拓展与成稿：发生器产出作为思想实验与观点探索提供，用于拓展思路、激发思考，不构成正式学术研究成果或事实性结论；正式使用请自行核验并遵守学术规范。